

民族主义、东方主义、全球化：亚运会

凡红

(爱尔兰中国研究大学 Cork 学院爱尔兰研究所主任, 教授)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洲,占世界陆地的 1/3,共有 18 000 000 多平方英里(4 400 万 km²)。拥有世界上 1/3 的人口。它比南、北美洲大,是欧洲的 4 倍。亚洲体育的多样性与更加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多样性联系在一起。主要有 3 个文化区:伊斯兰文化、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华文化。

尽管文化和社会方面存在差异,亚洲诸国从政治独立到社会转型及改革的近代历程中却有着相似的轨迹。20 世纪的亚洲诸国通过文化传承、吸收当代观点和抵抗帝国势力这样一种三项整合的方式形成了新式的政府。现代体育在促使政府重建、激发民族意识和唤醒东方意识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13 年,早期的亚运会是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形式开展的。首届亚运会于 1951 年在新德里举行,其宗旨是提高亚洲的运动水平,并且通过体育使亚洲诸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经过数年的发展,它已成为极具亚洲特色的运动会。现在,亚运会每 4 年举行一次,参赛国家的数量也由 1951 年的 11 个增加到了 2006 年的 45 个。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主席谢赫·艾哈迈德·法赫德·阿尔-萨巴赫曾说过:“亚运会已成为亚洲最大型的年轻人的盛会,仅亚于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坚信亚洲青年将继续满怀热情、友善与和谐庆祝每 4 年 1 届的亚运会。”

亚运会体现了势力、主权以及东西方之间、东方各国之间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领导权。然而,它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民族认同感,但总的来说,这种东方特色使亚运会经久不衰。

跟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亚运会也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主义。亚运会的结构基于国家身份,即亚运会联合会的成员必须是国家体育组织的官员,并往往代表着他们的国家。亚运会筹办委员会由国家奥林匹克委员或者由政府主管的国际体育联合会成员组成。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家以运动组织的形式在运动会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亚运会透视出政府跟运动员双方都通过体育来树立他们国家的形象,并且提高国家的政治力量。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在过去的 39 年中有

关亚运会成员身份的争执,以及苏加诺总统为了建立他在第三世界的领导权而利用第 4 届亚运会来挑战西方势力。

此外,就像奥运会一样,亚运会典礼也有助于唤醒民族主义,比如说:运动员展示自己国家的国旗和国歌,获胜者在宣布他们国名、升国旗、奏国歌的同时接受奖牌。这些体育仪式,正如哈格里夫斯所说的:“构建了一个强有力、聚集代表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使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定性的国家象征上,来激发他们的忠诚,也就是说,它有利于界定为当局比较倾向的看待权力和社会的方式。”这种国家性的象征主义在第 9 届新德里亚运会、第 10 届汉城亚运会和第 11 届北京亚运会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亚运会跟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是凝聚力的典礼、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战场,以及重树国家信心的方式。正如 Kellas 指出:“在许多国家,最受欢迎的民族性活动形式就在体育中,众多的人情绪高涨地支持着他们的国家队。”

然而,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不同的是,亚运会有着强烈的区域特性和东方主义。Said 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欧经验中的一种基于亚洲特殊位置上的东方方式。亚洲不仅邻近欧洲,也是欧洲最大的、最富有的和最古老的殖民地,是它的文明和语言、文化角逐,以及它给其他洲最深切和最普通的形象的来源。另外,亚洲还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对与其对立的形象、理念、个性、经验进行界定。”因此,政治家、学者、作家以及普通百姓都接受了这样一种东西方之间的基本区别作为阐述理论、史诗、社会现象及与亚洲有关的政治事宜的起始点。

体育已成为 20 世纪一个主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亚运会曾经代表了“一种西式的主导、重构,及对亚洲权威的风格”。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于权力、主权,及不同程度的复杂霸权的关系。但是,20 世纪西方在亚洲的霸权,使亚洲出现了自身的一个复杂的历史文化实体。亚运会和 GANEFO(Games of the New Emerging Forces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出现对欧洲和美洲势力教条主义、各种种族主义及帝国主义形成了一种挑战。东方性的体育是一种冲突与对立之间的对话,

也是东西方之间政治与体育领域的合作。这是一种对改变的渴望。

亚运会的历史并不是欧美在亚洲势力的迹象的简单历史。与西方自身一样，东方也是一个被赋予了西方现实与存在的社会文化实体。第14届韩国釜山亚运会会有44个亚洲国家参加。运动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团结，在亚洲各国中建立伙伴关系”，口号“新亚洲，新视野”为振兴亚洲定下了基调。在过去，亚运会增强了亚洲在国际体坛的形象，并提供了一个亚洲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长足发展的机会。它有利于打破西方对东方的霸权主义。

当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到一个全球化新时代的时候，经济结构调整、技术改革和文化再生的全球化趋势就兴起了。Giddens曾说过：“全球化定单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当今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已经不同于以前的人生活的世界了。”Holton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关于将单一世界或人类社会中的所有区域、国家和地方因素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的重要理念。”如Held, McGrew, Goldblatte及Peraton解释的一样，全球化是“一个（或者一系列程序）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关系转变的过程，通过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和影响来评价，跨洲发电或者地区间的流动和网络的活动，电力的互动与演习。”这样一个世界范围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的全球化影响到了亚洲各国，特别是那些新兴经济体，如中国、韩国和印度这些已经认识并从事于跨国资本企业的国家，他们越来越使自己融入到全通型的全球市场中去。

这种公司的资本制度，通过交易型的政治结构和交易组织的形式，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八国集团和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已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并使世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全球市场。最有力的一个例证就是耐克，它现在通过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来生产运动服饰。耐克通过使用其分包商，已经在中国

建立了一个制造厂来为耐克取得税务优惠和时段，降低国内劳工和环境法规的费用。

许多亚洲国家，如中国，正试图通过空间等因素的重组来吸引合法公司进驻并成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一员，将自己与网络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为国家发展作出的努力由公司的资本制度和中国政府及其政治体系一起执行。这种中央计划经济和政治体系在过去的20多年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显然是一个市场主导的体制。

国家经济体制的改变也波及到了国家体育体制。在原来中央计划体制下发展成的体育组织机构，现在在经济上将期待实现自给自足。其与NBA、国际足联、国际管理集团、英超联赛和曼联以及全球媒体的接触，清楚地表明中国体育已经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这个“俱乐部”。

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尽管在亚洲世界中存在着政治、思想意识、文化和经济及社会体系的差异性，但是体育全球化的特征事实上却是一样的：媒体的参与、对赞助的依赖、体育产业的兴起，以及与跨国公司的接触。

当体育的全球一体化驱使其在亚洲世界中改变方向时，就有这样一些问题存在：亚洲国家能够有效地保护当地的传统体育文化不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吗？亚洲国家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压力下保留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吗？

在世界范围传播的西方体育文化和形式，乍看之下似乎意味着体育文化整体进化过程中，一些单一的体育文化将不复存在。然而，亚运会的例子表明，亚洲国家的体育文化已经根深蒂固，在人类及其历史中，在社会体系和思想意识中已经存在，并将一直存在。

（本文系第三届社会体育国际论坛特邀嘉宾主题报告）

[编辑：黄子响]